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两难选择及其出路

孙启明 陈雅雯 邹心勇

摘要：中国经济在基本完成重工业化基础后，正面临经济转型升级调整。刘易斯拐点已出现，投资效率下滑、后发技术优势丧失、外需不足等系列问题凸显，转型已势在必行。结合国内外机构和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中国的投资驱动尚未走到尽头，投资要以民间投资为主，去产能过剩的主要措施在于鼓励消费和补贴消费；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土地红利主要惠及农民，把政府从债务中解放出来，重塑投资的微观主体。

关键字： 中国经济、转型、两难选择、出路

一、 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必然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进取中的困惑期。3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以GDP总量为指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世界第86位，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这期间，GDP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不同步、基尼系数反映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消耗资源过多，投资效率不断下降、出口受阻、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诸多长期潜伏在经济系统内部的深层矛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触发下骤然凸显，2008年四季度增长率突然放缓至6.4%。政府慌不择路，依赖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情急之下抛出的4万亿投资暂时平抑了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经济下滑，却错过了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低端化而藉此进行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使我国经济系统内部深层矛盾不但没有减缓，反而越积越深。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经历了35年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长不低于9%，这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无论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所给出的经验和启示都证明：中国的经济的转型势在必行、中国的经济转型刻不容缓。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可发现日韩两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前，无论是发展路径、要素约束、产业结构还是各种衡量工业化的经济指标都与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有高度相似性。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大抵相当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九十年代的韩国。日本经济在1955-1973年处于高速增长期，年均经济增长9.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韩国在1962-1990年保持年均8%经济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之前，有必要以日韩两国为分析样本，详细分析其转型前的人力、技术、资本等要素与经济矛盾的矛盾等现象，全面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以说明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必然性。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GDP占比

	中国			日本			韩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0				26.00	32.00	32.00			
1960	23.38	44.49	32.13	13.00	45.00	42.00	36.00	20.00	44.00
1970	35.22	40.49	24.29	6.00	47.00	47.00	28.00	31.00	41.00

1980	30.17	48.22	21.60	4.00	40.00	56.00	15.00	41.00	44.00
1990	27.12	41.34	31.54	2.00	39.00	58.00	9.00	43.00	48.00
2000	15.06	45.92	39.02	1.40	32.20	66.40	5.00	42.00	53.00
2010	10.10	46.75	43.14	1.47	27.87	70.57	2.60	36.52	60.88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由上表可知：2010年中国的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0.10、46.75和43.14，与日本经济转型期的1970年的一、二、三产业的6.00、47、和47，以及韩国1990的一、二、三产业的9、43、48极其相近。从经济规律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都是第一、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从上表三个国家的一、二、三比重来看，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0%左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在45%左右，是一个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结点。个中原因可能是重化工业步入巅峰，农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不得不依赖科技服务、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所致。下面就经济转型客观必然性的深层经济原因作如下分析：

1、劳动力要素束缚已出现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被认为是生产函数中的首要决定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的益处。但自2004 年春天开始，“缺工”或“民工荒”等词汇屡见报端。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到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再到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直至江西、湖南、河南等劳动力流出地区，“民工荒”和“技工荒”大范围地蔓延，结构性失业的大面积存在。在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农业部调研表明，2006 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年均增幅小于10%，而目前已有15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且幅度在15-20%上下，如图1与图2所示。总体而言，劳动力供求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数据中国劳动人口规模出现了绝对数量减少的现象，确认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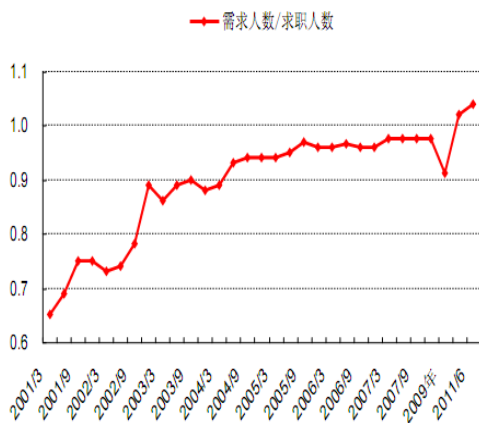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供需比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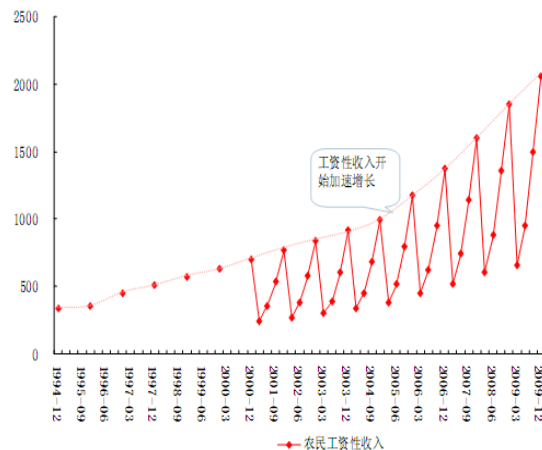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工收入增长

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同70 年代初期的日本和90 年代初期的韩国比较相似。日本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中学毕业生人数减少，而“岩户景气”的持续使得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尤其是中小企业招工困难，以至于初中毕业生

1.周金涛.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原因、表现与启示[C].中信建投证券,2011:10-20.

稀有到被称为“金蛋”。1967年，日本招工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超过1，实现了超充分就业经济^[2]。从19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5%，工资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速，1976年高达25%。从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即人口抚养比看，1970年达到了二战后的最低水平30.5%，随后抚养比逐渐上升，这是典型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3]。



图3 日本平均工资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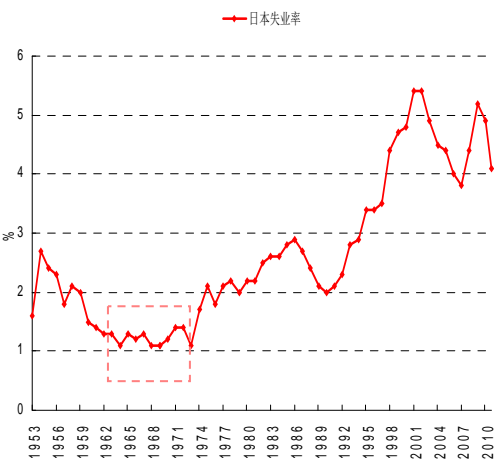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失业率情况

韩国经济在1980年初完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80年代中期韩国进入新一轮繁荣，伴随1988年奥运经济的到来，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在1988-1990年期间，韩国出现历史最低水平的失业率1.5%。但三年间平均工资上涨89%。如图5与6所示，即出现“高工资、低失业”的劳动力市场繁荣。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终结，刘易斯拐点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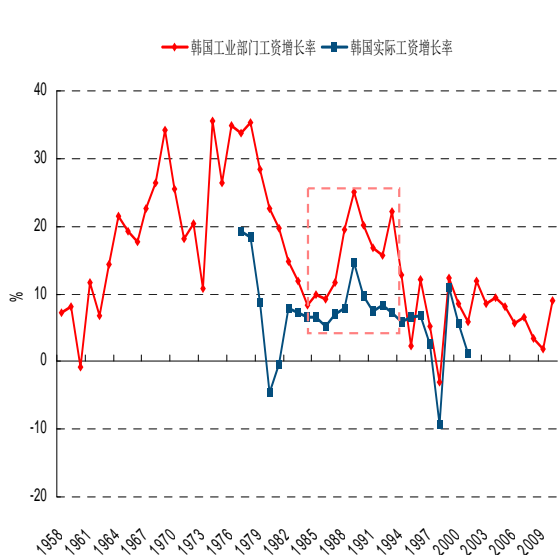


图5 韩国平均工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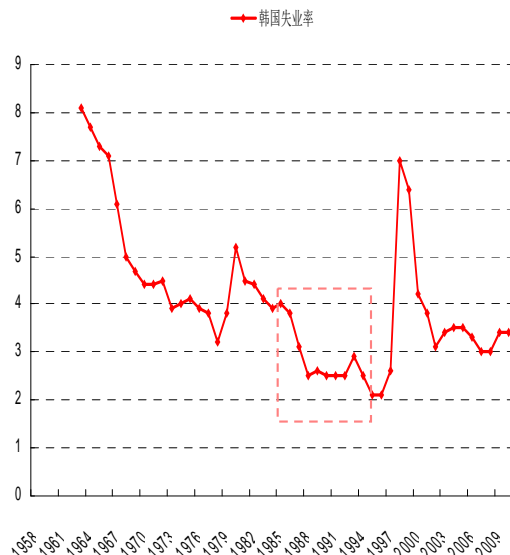


图6 韩国失业率

2. 周金涛. 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原因、表现与启示[C]. 中信建投证券, 2011:10-20.
3. 郑联胜. 转型中的经济结构特征—基于日韩的分析. 中信建投证券, 2012:7-15.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2、投资效率衰减，资本贡献行至尽头

中日韩三国经济高速发展都是政府直接推动并干预的结果，本质上都是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动投资并鼓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资本形成率均高达40%。中国自2003以来，资本形成率持续维持在40%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大幅刺激投资的政策导致资本形成率在2009年达到48.2%，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同时带来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从国际比较来看，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美国2010年投资率只有15.5%，其历史最高水平（1943年）也不过23.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的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80%来源于技术和效率的进步而非资源投入。即使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起飞时期相比，这些经济体投资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不过是36.4%（1973年）、38%（1991年）、30.9%（1975年）。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掩盖了中国投资过度的问题。

投资拉动型经济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而我国能源消耗已不能支持。国家统计局公告称，2011年煤炭消费量增长9.7%；原油消费量增长2.7%；电力消费量增长11.7%。与“经合组织”相比，中国每单位能耗高出3.5倍、电耗高出2.5倍。每万美元消耗的铜、铝、铅、锌、镍合计70.47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4]。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而这仅仅是环境污染的局部计算。并且不包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据2001年西部生态状况调查报告，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为4左右，略高于美国，90年代初期降低至1.5，即投资1.5个单位的资本，就有1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是当时最有效率的资产产出比，甚至比日本2.5的水平还低很多。但自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资本效率就持续下降，尽管在“十五”和“十一五”过度期间，中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投资的效率有所提高，但如果除去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产出的大幅增加，中国的资本效率并没有提高很多。2009年增量资本产出率高达6，投资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如图7所示，提高生产率将是释放中国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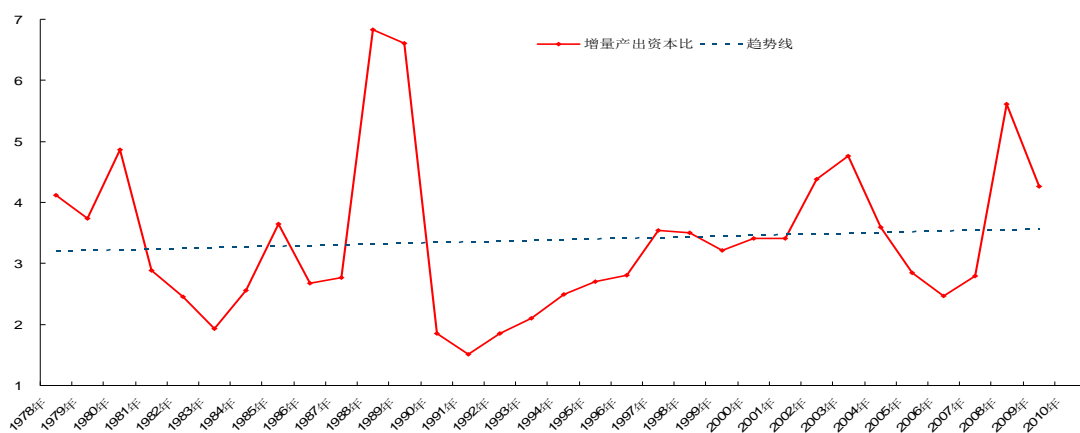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投资效率走势

4.陈文科.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J]. 江汉论坛, 2011 (003): 5-15.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日本在60至70年代间，通过“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内生加速机制，其重化工业得到深度发展，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从图8日本投资率走势图可见，50年代末，投资率为28%，1961年达37%左右。由于存在过度投资，1960-1965年间进行阶段性调整，1965年后投资率再次从31.5%上升至1970年的38.4%，之后一路下行到1980年代中期，投资率仅为28%。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看，在日本1960年代伴随着投资率的快速上升，其对GDP的贡献也逐渐增强，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则逐年的下降如图9。投资拉动模式既造就了日本发达重化工业经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产业结构^[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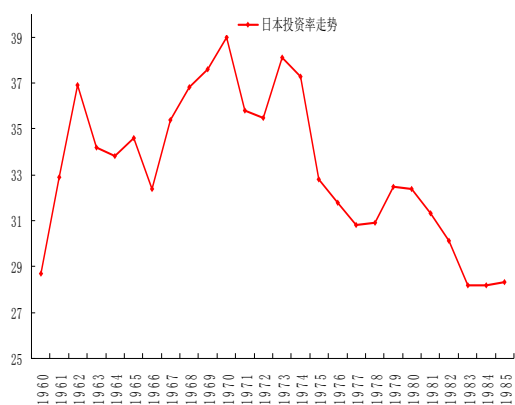


图8 日本投资率走势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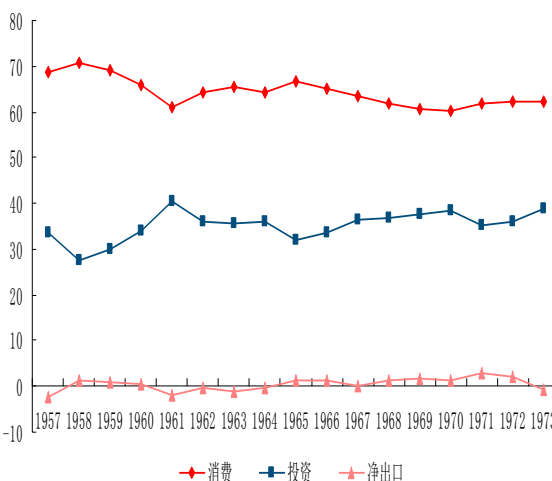


图9 日本GDP结构

60年代以后，国际资源价格一路走高，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下降，资本的内生加速机制也已趋于消失。韩国资本形成从60年代开始一路攀升至1991年，投资率创历史性的新高，达39.7%其后进入一个短暂下行的过程，1993年投资率为35.7%，但是其后又有明显的上升^[6]。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开始逐渐下降，根据IMF的数据，韩国在1987年的增量产出资本比超过7，在1990年仍然高达5以上。从图10可看出，1970年代韩国增量资本产出比为2.5，此后资本产出比持续走高，80年代后期更是高达7，由此可见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的效率在持续下降。

5.刘彦文.战后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2011,(5):61-64.

6.郑联胜.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基于日韩要素的分析[C].中信建投证券, 201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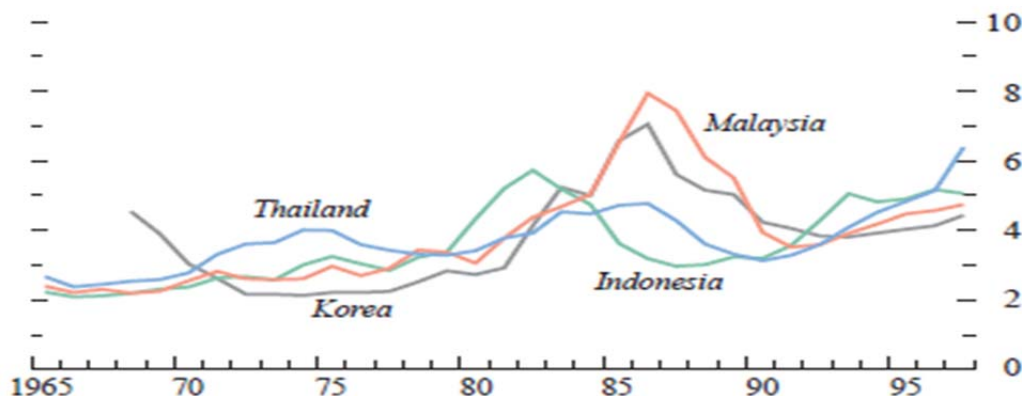


图 10 韩国增量资本产出比

*数据来源于彭博数据库并整理

3、后发技术优势逐渐丧失

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实现技术整体升级。根据科技部公布2011年中国科技实力清单，当今的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位置已经和70年代初日本，90年代初韩国当时的地位相差无几甚至已经超越。但在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材料等战兴产业领域，具有高技术壁垒、高附加值的技术都是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机密，受到了严格的进口管制，引进难度非常大。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差别，与日韩相比，中国在高技术领域遭到的发达国家的限制更为严重。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引进海外技术，日本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1960年代末期，除了部分军事航天方面的尖端技术，日本几乎引进了欧美自1930年代以来的全部先进技术，可以说日本当时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赶上了欧美国家。根据墨田等人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要素的分解研究，在1960年至1973年间资本、劳动、消费、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的分解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增加。而在此期间，相当程度上反映技术进步速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次于资本，但随着技术引进速度显著放缓，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逐渐下降，甚至出现负贡献，这是后发技术优势显著下降的表现^[7]。

1962至1993年，韩国共引进国外技术8766项，支付技术使用费78亿美元。1986—1992年间，共引进4521项特许权合同技术，支付费用超过56.22亿美元^[8]。1990年和1991年韩国引进技术738项和528项，分别比上年减少了33%和21.2%，且效果不断下降^[9]。到80年代末，韩国产业技术水平在众多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水平。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开始逐渐限制高新技术的输出，并利用知识产权等方式防止其他国家进行模仿，技术引进越来越困难。

据韩国学者测算，1981至1985年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为33.5%，到1986至1990年该比率下降到了25.5%。此前支撑韩国技术跨越式提升的后发优势已基本消失，技术进步路径逐渐转向了艰难而缓慢的自主研发之路。随着后发优势的日渐丧失，技术提升速度的下降也必然对经济增速形成拖累。时至今日，

7.郑联胜.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政策及其效果——基于日韩的分析[C].中信建投证券, 2012:3-10.

8.郑联胜.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基于日韩要素的分析[C].中信建投证券, 2012:6-12.

9.周金涛.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原因、表现与启示[C].中信建投证券,2011:10-20

和当年的日韩一样，中国在技术领域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的阶段已成过去。

4、外需动力下降

2011年，我国贸易依存度攀至78%。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使得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外需减少，而国内要素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贸易依存度下行势在必行。同时，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压力下，从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接近超过了30%，预计今后很长时间内会保持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加工贸易为主制造业出口成本压力逐渐加大，考虑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专家称：“一些国家还针对中国商品直接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维护本国产业的市场份额，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贸易政策，例如在出口方面实施了钢铁出口资助限制；举行纺织品谈判和钢铁“自愿出口限制”的谈判等。由于进出口对日本经济影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高速增长结束70年代初期，美国为了应对不断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变化，1971年宣告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结束。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1973年2月转为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再度升值^[10]。

80年代末，韩国经济跃居世界前20强，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呈现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如图11所示，韩国贸易依存度从1965年的25%迅速攀升到1987年的72%。过高贸易依存度使韩国经济受国际影响较大。1989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得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过高贸易依存度使韩国经济受国际影响较大。1989年开始，世界经济的衰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4.13%下滑到1991年的-0.23%，日本经济增长率则从1988年的7.15%下降到1992年的0.82%，1993年的0.17%。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1987年，美国宣布取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790种商品的特惠关税，1989年起取消“四小龙”的特惠关税，宣布解决韩国对本国造船业的补贴问题，并重新确定韩国对美国过钢铁出口限额。这直接导致对韩国的出口需求急剧萎缩。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强迫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开放市场，升值货币如图12。1988年底，韩元兑美元升值30%。这对经济依赖出口，特别是严重依赖美日市场（1989年韩国对美日出口分别占到出口总额的33.1%和21.6%）的韩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对经济依赖出口，特别是严重依赖美日市场的韩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贸易摩擦的日渐增多，1990年，韩国出现了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由1986至1988年的12%以上降到了1992年5.8%水平。

比当年的日韩相比，当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大国，而且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中国与日韩的境况完全相反，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比当年的日韩更为严峻，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未来外需动力越来越弱，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我国而言，威力不可小觑。

10.郑联胜.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政策及其效果——基于日韩的分析[C].中信建投证券，2012: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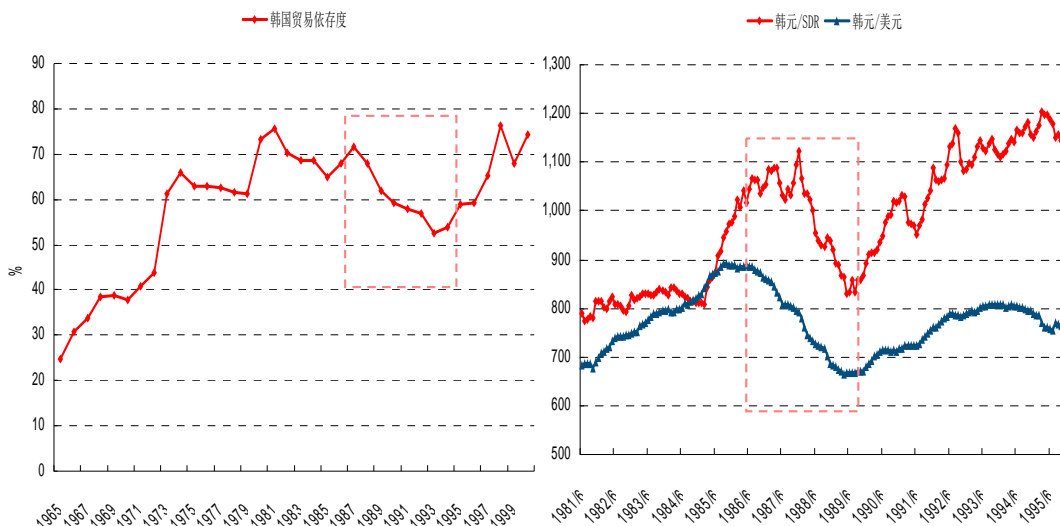


图11 韩国贸易依存度

图12 韩国汇率走势

二. 中国经济转型两难困惑

1、房地产投资与价格居高不下与打压可能带动经济衰退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而2007年为8%。而即使在日本泡沫高峰期，该数值也从未超过9%；美国从未超过6%。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的空置住房大约有381万套。据查诺斯的报告，中国已为10亿人口建立了30亿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足以为每个人提供一间标准的私人办公室。同时，对冲基金公司Pivot（皮沃特）Capical Management认为房地产赖以生存的信用体系表现出了诸多金融脆弱性的指标：信贷过快增长（房地产热潮）；道德危险；关联方贷款（当地政府基建项目）；贷款容忍度（地方政府贷款）；影子银行体系的增长（一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与此同时，不断上涨的房价造就了惊人的可负担比率，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超过8，北京大概在25，而上海大约为20。

根据《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4%的中国富豪表示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首选，这一比例已连续四年超过60%。被调查企业家认为房地产开发的回报是实业回报的数倍以上。企业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何时破灭仍需时间检验，但中国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空置率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索罗斯、吉姆·查诺斯、吉姆·罗杰斯等全球投资大师不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基于一份称中国在大量建设现代金字塔的研究报告，通过卫星图片公布了中国的鬼城影像报告，此报告称这是房地产泡沫显而易见的标志：整座城市街道空空荡荡，政府大楼宏伟壮观，有些城市甚至建在完全不适合人居住的不毛之地。简直就是当代的金字塔。河南郑州新区被他们称作中国最大的“鬼城”。《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中国从南到北众多三四线城市新建城区空空荡荡，宛若“鬼城”，内蒙古鄂尔多斯及二连浩特、江苏常州、湖北十堰等均在名单之列。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2013年陆家嘴论坛直言，中国热钱有外流趋势，包括房贷在内，利息、利率上升不可避免。中国房地产炒作成分比较明显，一线城市是房价的问题，在很多城市是量的问题，房地产崩溃会在某些城市发生，若房地产升值预期变成贬值预期则房地产会发生较大波动。

索罗斯在2013年的博鳌论坛直言，中国的房地产业现在已下降到GDP的34%，

无法为剩下的三分之二经济带来资金支持，而且，由房地产推动的投资过热、国有银行积累了坏账、企业贷款难，种种现象说明现有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只能转变，但是房地产业与金融的关系密切，对上下有产业相关度很高。如果打压必然带来经济衰退。

2、去产能过剩与就业不足的两难选择

2012年的中国，制造业全面产能过剩的危机似乎一夜爆发。从传统的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石化，化肥，煤炭，汽车，家电，电力设备，造纸，纺织到新兴产业中的光伏，风电设备，LED等行业，全面出现了需求不足，究其原因，是多年的投资积累再加上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天量货币如洪水一般投进了上述行业。有统计表明从2009年到2011年全球新发的货币当中，竟然有48%是人民币！在天量的信贷计划指标的行政命令下，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盲目上马，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的工业项目。很多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和造纸，即使未来十年都不投资，现有产能也能满足市场需求。短短几年的疯狂建设，就透支了未来十年的有效需求。任何经济都会有高峰也有低谷。2012年的中国已经明确进入了低谷期。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经济自我的调节过程。4万亿刺激过度了，自然要歇几年。在总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企业只有通过降价才能去库存，必然是盈利下降、投资下降、就业下降、收入下降，这个衰退最终会传递到家庭，传递到消费模式，中国虽然有13亿人口，但失业增多，收入下降，会加剧需求不足，加剧产能的相对过剩。

3、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流动性紧缺与信贷规模、地方政府债务的恶性扩张并存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研究140年来60余次金融危机之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信贷快速增长是金融危机最好的预测指标。2009年，中国信贷规模超过GDP的140%，接近1991年的日本和2009年的美国，即200%的危险水平。2011年，中国企业的债务杠杆迅速攀升至GDP的130%，企业杠杆比率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自2008年以来，这种高杠杆的结果是大量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导致许多部门，如太阳能、钢铁和造船产能过剩。一些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开始爆发，作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无法偿还3月份到期的30多亿元的票据该公司自2012年第一季度已连续四个季度亏损，并正在重组。

较高的公共债务水平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学家安德鲁·亨特(Andrew Hunt)估计，自2007年以来，中国真正的公共债务增加额约为GDP的60%左右。如果再次重复2009年的信贷刺激方案，其真正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希腊。太多的钱用于投资，结果却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还清债务。2009年，当时非金融机构信贷高达GDP的45%，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已经沉迷于信贷，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增长来支持经济。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国内信贷一直迅速增长提供的融资造成的。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前景

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发展展望2013》报告预测。受强劲消费和财政支出的拉动，明年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2%和8.0%。恒生、汇丰、瑞银均认为中国2013年能实现不低于8%的经济增速。

尽管，部分外国舆论从个别数据和局部现象片面得出中国经济下滑的结论，但有些外国专家认为“唱衰中国”论调过于悲观，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实现从注重

增速到注重质量的转变，中国能够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并继续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量子基金”的前合伙人罗杰斯表示，中国正在坚定不移的执行一项旨在放缓经济增长步伐的长期计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曾经是增长动力的贸易部分将出现转型，中国正在经历这种调整，而且在市场和政府支持政策下，中国将出现更多的附加值更高的经济活动。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表示，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是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成功避免了高通胀、高失业，并有效应对了来自外部的经济危机冲击，避免了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为地区与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信金中央金库高级审议官露口洋介表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大多可以很好解决。关于收入差距、消费与投资的失衡等问题，可以通过推动城市化、加强财政对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来解决。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就可跳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一些中国企业家也坚定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观点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有三大变化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将由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向世界最大的消费国转变，二是中国将向最大的资本国转变，三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快速发展。只要未来政府的政策重点更加偏重于关注民生，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加强社会保障等方面，就能促进中国消费增长。因此，从投资角度看，他十分看好消费和消费升级相关领域，如医药、医疗、奢侈品、高端服务业等行业。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认为，基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容量，未来五年内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应该在中国。但王石同时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产品需求十分旺盛，但总体质量不是很高。

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不是从收入水平来看，而是从后发优势的大小来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中国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潜力相差甚大。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至90%以上，这表示中国城市化还存在巨大空间，因此房地产业对中国依然非常重要。林毅夫认为，金融机构可以支持房地产业发展，只要金融监管到位，将房地产商贷款、购房者按揭贷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房地产业在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来打破增长的瓶颈。他提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回顾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可看出，两国在追赶期时期均采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发展策略，在基本完成重工业化基础后，开始经济转型升级调整。当前，中国发展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出现、投资效率下滑、后发技术优势丧失、外需不足等系列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结合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本文认为：中国的投资驱动尚未走到尽头，只是投资的主体要以鼓励民间投资为主，政府的作用在于打基础和引导投资；去产能过剩的主要措施鼓励消费和补贴消费；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土地红利主要惠及农民，把政府从债务中解放出来，重塑投资

的微观主体。农村城镇化的问题让农民来办，政府做好宏观规划和投资引导。

参考文献：

- [1]. 周金涛. 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原因、表现与启示[C]. 中信建投证券, 2011:10-20.
- [2]. 郑联胜. 转型中的经济结构特征—基于日韩的分析. 中信建投证券, 2012:7-15.
- [3]. 陈文科.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J]. 江汉论坛, 2011 (003): 5-15.
- [4]. 刘彦文. 战后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 2011, (5):61-64.
- [5]. 郑联胜. 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基于日韩要素的分析[C]. 中信建投证券, 2012:6-12.
- [6]. 郑联胜. 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政策及其效果——基于日韩的分析[C]. 中信建投证券, 2012:3-10.
- [7]. [日]中村隆英. 日本经济的成长与结构[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7:221.

作者单位：孙启明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雅雯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邹心勇 北京信达证券